

眾聲喧嘩即倫理實踐：從 Mikhail Bakhtin 的語藝觀談起^{*}

王孝勇^{**}

摘要

本研究旨在從 Mikhail Bakhtin 的語藝觀，就眾聲喧嘩作為倫理實踐進行理論建構。首先，透過將眾聲喧嘩饒富辯證性與烏托邦色彩的倫理向度，本研究勾勒其語藝觀具體展現為詰問的必要性、倡議的有限／效性以及行動的策略性。其次，藉由 Bakhtin 複調小說作者與主角在外在對話性中重塑話語階層的主張，並進一步接合 Butler 的諧擬展演，本研究指出語藝言者策略性地依附於社會規約，但又能伺機暴露既定文化的強迫性與暴力性，即是眾聲喧嘩作為倫理實踐的語藝動能。

關鍵詞：巴赫汀、外在對話性、倫理實踐、眾聲喧嘩、語藝、諧擬展演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13.8.1 至 2015.7.31）「Mikhail Bakhtin 眾聲喧嘩的倫理及其倫理困境之反思：以恐同論述建構為例」（NSC-102-2410-H-126-009-MY2）第二年期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鼓勵與修改建議，以及研究團隊的討論與思想激盪。

^{**} 王孝勇為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hywang2@pu.edu.tw。
投稿日期：2014/9/1；通過日期：2014/9/25

壹、眾聲喧嘩：從現象到觀點

語藝學對於 Mikhail Bakhtin 的系統性討論，應出現於 1990 年代。其中，來自於小說話語研究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由於在 Bakhtin 的原意中被大幅度地用來分析歐洲中世紀狂歡節儀式風格的民主化，所以部分語藝學者主張眾聲喧嘩對於多元離心力的頌揚，或對當代政治體制與社會文化中的諸多語藝實踐，提供了具有啟發性與解釋力的批判基礎（Halasek, 1998；Jasinski, 1997）。

此外，不同於文學、哲學、藝術、人類學、政治社會學等學門多半僅套用 Bakhtin 所創造出的術語（包括眾聲喧嘩）於一般既定現象或文本的描述性分析（見林意仁、黃厚銘，2011.09；Frekko, 2011；Heath, 1992；Hopkins, 1989；LaFountain, 2010；Mboti & Tagwirei, 2014；McIntire, 2005；Saljooghi, 2008），語藝學者除了試圖對比 Bakhtin 眾聲喧嘩與當代語藝情境之間的雷同性或差異性，更傾向將 Bakhtin 的主張視為一種觀點（perspective），亦即一種理論性的看世界的方式。從這個立場和預設出發，論者認為眾聲喧嘩在 Bakhtin 筆下所源自的歷史條件及其欲回應的社會文化脈絡，較有機會被批判性地正視和反思。相關研究成果的累積亦有助於回溯性地將眾聲喧嘩觀點，重新應用於現實世界的語藝現象詮釋和分析。近來更有諸多語藝學者試圖透過眾聲喧嘩觀點所揭示的語藝歷史與語藝意識，重返古典語藝的知識體系尋找可供對照或對話的理論資源，並據此就語藝的倫理向度和本質提供嶄新的問題意識。這裡所說的語藝倫理向度和本質，除了肯認語言意義源自於言者——聽者——語藝主題（subject）之間的互為主體性；更強調的是，語藝實踐所指涉的語意之外的（extra-semantic）社會文化形構或重塑，應被特別加以凸顯（Harris, 1998；Lachmann, 2014.07；Schuster, 1998）。目前 Bakhtin 與語藝學之間的知識銜接或理論對話，大致有以幾個方向：

其一，許多語藝學者直指柏拉圖晚期在對話錄 *Phaedrus* 中，一改早年於 *Gorgias* 中對於語藝乃是諂媚之術或政客騙術的指控，旋即以「辯證的科學」（Herrick, 2009: 68）重新界定並肯認語藝學的範疇，^[1]與 Bakhtin 在眾聲喧嘩觀點中拒斥理性教條主義所生產的權威獨白話

語，並藉此表述意義的動態性、未了性具有相當的關聯性。更有甚者，Bakhtin 透過蘇格拉底對話 (Socrate's dialogue) 或小說話語的詼諧 (laughter) 與多音 (polyphony) 所陳述的「嘲諷之智」(ironical wisdom; Gardiner, 2012: 56)，試圖揭示出一種強調創意創作 (invention)^[2]、開放辯論、積極交流的語藝觀，更被認為與柏拉圖對於饒富辯證性的「真語藝」(true rhetoric) 得以幫助我們追尋正義和真理的主張 (Golden, Berquist, Coleman, & Sproule, 2010: 55; Murphy, Katula, Hill, Ochs, & Meador, 1995: 24; Murphy, Katula, & Hoppmann, 2014: 33)，互相輝映。

其二，有鑑於 Bakhtin 藉由小說話語對於意義變動性與未了性的掌握，旨在「積極尋求掙脫枷鎖、破繭而出、轉化壓迫的語藝動能」(王孝勇，2014: 157)，然而 Bakhtin 在論及語言與民主化的相關討論中卻少對語言如何具有革命意識有直接且深刻的理論說明 (Gardiner, 2012: 67)。Bakhtin 學圈的研究者雖然曾經嘗試從諧擬 (parody)、後設諧擬 (metaparody) 等角度陳述日常性語言的諧擬表述如何召喚先前表述並與之對立，並進一步賦予語言嶄新的話語意識或語意權威 (semantic authority; Morson, 1989: 67)，但相關的討論仍流於形式化。對此，語藝學者主張柏拉圖一脈的辯證語藝觀所蘊藏的烏托邦的色彩，或指引了我們在國家暴力和教條主義日益高漲的時刻，如何積極轉化社會既定傳統以實踐眾聲喧嘩的倫理 (Murphy, 2001: 261; Weaver, 2009: 23)。

其三，雖然 Bakhtin 就小說話語或狂歡節儀式特性此類相對開放的文本空間進行分析，旨在投射出他對於外在實體世界與政治民主的想像嚮往，但論者仍批評 Bakhtin 似乎僅掛心於論述不同話語意識之間的「內在對話性」(inner dialogicity)，亦即言者表述在對話鏈結中對過去的召喚、對現下的回應，以及對未來的想像投射 (王孝勇，2009，2011，2012)；相對來說，日常性語言本身的「內在未來導向」(intrinsically future-oriented; Gardiner, 2012: 57) 或眾聲喧嘩本身的社會政治效應 (socio-political effects)，在 Bakhtin 的字裡行間則較付之闕如 (王孝勇，2013: 25)。對此本研究主張，以 Bakhtin (2004: 34) 的自我陳述「對話關係不僅是種純然語意或語言學的，其

本質乃是種語藝的現象」為基礎，語藝言者如何選擇策略以進行「說服」（Foss, Foss, & Trapp, 1991 / 林靜伶譯，1996：16），乃至於重建外在世界的語言系統秩序的主張（Herrick, 2009: 71），已是眾聲喧嘩作為倫理實踐所不可忽視的重要面向。這種語言指向外在世界，透過辯證進行社會改造的「外在對話性」（outer dialogicity），可初步定義為：語藝言者（rhetor）在社會文化脈絡中（而非僅限於語言內在的文本空間裡）策略性地依附於語言中的社會規約，但又能伺機暴露既定文化脈絡的強迫性與暴力性，以將日常性語言中的意義轉換（re-accentuation）與話語意識挪用（appropriation）賦予意識形態鬥爭的語藝動能。外在對話性也是當代後結構主義者持續投入鑽研的理論範疇（見 Kristeva, 1980）。

綜上所述，本研究初步發現語藝學對於 Bakhtin 的理解和討論，大致肯定其眾聲喧嘩觀點確有一種肯認主體存在並嚮往政治民主的倫理向度（王孝勇，2014；邱戈，2011）。亦即透過話語意識交錯的內在對話性，眾聲喧嘩試圖揭櫫一種離心多樣性、曖昧多義性、變動未了性、日常民間性的意義系統與語言世界；它甚至具有反思既定社會規範、超越階級藩籬的語藝動能。然而眾聲喧嘩在示現日常性語言的內在對話性之餘，它如何奠基於特定的語藝歷史與語藝意識，進一步展現其辯證性和烏托邦色彩以實踐眾聲喧嘩的倫理；亦即眾聲喧嘩的外在對話性在主體性形構上意味著什麼、在語藝意識打造上如何可能、其語藝動能從何體現，這一系列的提問在現階段的 Bakhtin 研究乃至於語藝學對 Bakhtin 的相關討論裡，仍缺乏直接的說明。對此，本研究主張透過外在對話性觀點的穿針引線，一方面可對 Bakhtin 的語藝觀進行歸納釐清和延伸探討，另一方面更藉此就眾聲喧嘩即倫理實踐進行論述論證與理論建構。Bakhtin 對於外在對話性的討論，散見其對於小說話語的歷史考察與分析中。

本研究視眾聲喧嘩為倫理的實踐。首先，透過對小說話語前傳（prehistory）的語藝歷史分析，本研究試圖釐清眾聲喧嘩的語藝歷史和語藝意識，並直指 Bakhtin 饒富辯證性與烏托邦色彩的語藝觀及其倫理向度，具有反個人唯心論、反階級化約論，以及復興俗民知識（secular knowledge）的特質。其次，藉由 Bakhtin 所描繪的作者與主

角在外在對話性中重塑話語階層的主張，並進一步接合 Butler 的諧擬展演觀點，本研究將指出眾聲喧嘩的倫理實踐必須立基於特定的外在對話性，否則難以為繼。本研究發現，透過外在對話性的理論嫁接，眾聲喧嘩的語藝觀和倫理實踐將確切地體現為詰問的必要性、倡議的有限／效性以及行動的策略性。這或許有助於我們回過頭來檢視當代諸多（貌似）眾聲喧嘩的倫理實踐和語藝行動。

貳、眾聲喧嘩的語藝歷史與語藝意識

Bakhtin 眾聲喧嘩的觀點出自於他對於小說話語內在對話性的分析。一般認為，小說話語所展現的離心世界，即是眾聲喧嘩觀點所投射的主體存在與政治社會想像（王孝勇，2014）。在此，眾聲喧嘩可被定義為：在社會文化脈絡的文本意義空間中，不同話語意識頻繁交錯、對話共融，以利言者轉化、諧擬他人觀點並進行自我表述的意識形態環境（Bakhtin, 1994a）。雖然按照 Bakhtin（2002a）的說法，直到十八世紀的浪漫主義時期，歐洲知識界才逐漸興起小說話語的理論研究。在那之前，小說甚至不被視為一個獨立的文類（genre）。但是 Bakhtin（同上引）主張若我們延伸視野的縱深，則不難發現小說話語有其漫長的醞釀過程，其最早可上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這也是語藝學起源和蓬勃發展的年代）。透過 Bakhtin 所舉出的古希臘以降到羅馬時期的諸多文藝創作（包括民俗節慶），本研究試圖對小說話語與眾聲喧嘩所提供語藝歷史脈絡和語藝意識，進行初步的描繪勾勒。

一、小說話語前傳：以古希臘到羅馬時期的文藝創作為例

Bakhtin（2002a）首先綜觀性地指出，「詼諧」（laughter）與「多音」（polyphony）乃是古希臘羅馬時期文藝創作的風格，這亦是最古老的將他人話語客體化（objectify）並加以再現的機制。

詼諧風格主要來自於古希臘文學史詩中的「滑稽——戲謔的反陳述」（parodic-travesty counter-presentations）。它可被界定為「對正典文學作品的插科打諢式模仿」（Bakhtin, 2002a: 50）。其於文學中扮演著嘲笑神聖崇高文學正典的單一話語權威、片面嚴肅性與直白獨白

性的角色。例如：古希臘時期出現了一種特殊的諷刺詩文（satire）。故事主角名為喜劇奧迪賽（comic Odysseus）。他的人物形象建構乃是透過跟諸多瘋癲主題加以結合，並非荷馬史詩原典中的莊嚴神話。Bakhtin（同上引：54）形容在這類的文學作品中，主角奧迪賽通常會戴上小丑的帽子、牽著馬和牛犁田，假裝自己瘋了以免被迫去上戰場殺敵。在此，主角不再與歷史上的特洛伊戰爭或國家史詩的打造產生指涉性或關聯性，而僅具有諧擬和諷刺的意涵。

Bakhtin（2002a: 53）就古希臘文藝創作舉出的另一個例子是「第四戲劇」（the fourth drama），它是一種緊接著在悲劇三部曲之後立即搬演的諷刺劇（satyr play）。Bakhtin 描述第四戲劇跟其模仿的悲劇三部曲一樣，有相同的敘事和神話主題，但卻是以詼諧化的方式處理。然而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時期的第四戲劇對於悲劇原典的嘲諷比較隱諱曖昧、聊備一格。也就是說，古希臘時期文藝創作中的詼諧，仍屬低調簡約，並未一躍而成為當時主要的藝術風格。

必須說明的是，以上兩個文藝創作案例所展現的詼諧風格，在 Bakhtin 的歷史考察中，乃是古希臘時期普遍化的生活實踐。當時人們已對詼諧風格習以為常，而非視其為異端邪教。對此，Bakhtin（2002a: 55）明白指出希臘的文學意識並不認為對國家神話的「滑稽——戲謔的反陳述」是種不敬或褻瀆。希臘人甚至毫不介意地相信並宣稱至少有一個長篇的喜劇詩文是出自荷馬之手。此外，Bakhtin 進一步指出，古希臘時期詼諧風格的文藝創作在衝破單一的教條主義，並揭示出真實世界極為衝突和異質的樣貌之際，反而可以回過頭來幫助人們檢視嚴肅話語的本質與限制。而這樣的檢視完全無損莊嚴史詩的存在價值和藝術價值。據此，Bakhtin 認為詼諧風格並不是虛無主義式的否定論，而是體認到所有直接話語或宰制論述都僅為特定時代、時期的代表或特性，它隨時都在改變和更新（同上引：60）。^[3]

承接源自古希臘且普遍化的詼諧風格，Bakhtin（2002a）形容羅馬時期的文藝創作更試圖提升喜劇的位階，並大量呈現莊嚴體 vs. 喜劇於同一場景中並置對照的情形。例如第四戲劇在羅馬時期，面臨了比古希臘時期更迫切的民間需求。羅馬時期的第四戲劇已不再是悲劇之後的聊備一格，而是「必要且必然」出現的「文學即興劇」（the literary

farces)。透過演員與觀眾臨場互動，第四戲劇以更大膽和頑強之姿，明目張膽地針對先前悲劇表述中的細節材料加以攻訐、改寫、重製（relocated）。在此，「羅馬諷諧」（Roman parody）無意回首重拾那些既定已了的國家神話及其道德觀與價值觀，而是透過口語傳播的力量帶著諷諧風格走出劇場和文學場域，廣泛地創造並影響了當時庶民文學和民間儀式的語藝展演（rhetorical performance）與語藝實踐（同上引：58）。例如羅馬的農神節儀式中，小丑是統治者的化身，奴隸是主人的化身。或是在藝術展示中故意讓兩幅壁畫並置相對，一幅畫著神話故事中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另一幅畫著出浴的裸女被巨蛇纏身，旁邊還有農夫拿著破爛木棍（假扮英雄）並虎視眈眈地欲前往救援。又或者在特定的加冕儀式中，允許士兵嘲諷（而非歌功頌德）戰場得勝的將軍，還有在肅穆的葬禮中允許笑聲和農神節儀式（同上引：56-58）。Bakhtin 指陳，這樣的曖昧多義性（ambivalence）大幅度地影響中世紀、文藝復興，乃至於當代小說的修辭風格。

承上，Bakhtin（2002a: 57）直指，諷諧風格在羅馬時期「活出全然不同於古希臘時期的生活」。雖然沿著莊嚴文體和權威話語而生的諧擬文藝創作於古希臘時期就已出現，但不同於古希臘仍有鞏固國家神話和史詩中的諸多元素和時空條件之傾向（Bakhtin, 2002b: 110），羅馬時期的文藝創作展現出更為基進且政治性的語藝意識（rhetorical consciousness）：它一方面試圖瓦解國家神話透過語言所建立的同質化權力（homogenizing power）和語言暴政（Bakhtin, 2002a: 60-66）；另一方面也把語藝言者看似個人化的「滑稽——戲謔的反陳述」賦予了外在性（outsideness）的價值。這裡的外在性，具有「從別人／外在的眼光看語言／自身」（同上引：60），以及言者「透過語言與外在世界／他人表述激烈鬥爭」（同上引：66）的雙重／雙向意涵。對此，Bakhtin 直指外在性的諷諧風格將生產創造出不同（國家）語言互為攻堅抗辯的多音世界；而唯有在多音世界的情境條件下，諷諧風格與諧擬表述才得以成長茁壯，益發完備。

綜上所述，本研究除了依循著 Bakhtin（2002a: 61）所主張的「滑稽——戲謔的反陳述」得以在古希臘到羅馬時期的文藝創作中被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意識形態高度，更強調的是特定的風格得以讓不同話語

意識「對外」體現不同文化與歷史力量之間的爭辯和對話，建構眾聲喧嘩的語藝意識。在此本研究認為，Bakhtin 透過爬梳古希臘到羅馬時期小說前傳的語藝歷史，清楚論述的乃是眾聲喧嘩透過詼諧和多音所逐步體現的「徹底的對話雜交性」（completed dialogized hybrids；同上引：82），及其於民間文化中體現和存在的必要性。這裡所透露出的眾聲喧嘩觀點的倫理向度和語藝觀，值得持續加以探索。

二、Bakhtin 的語藝觀（及其與柏拉圖語藝觀的微型對話）

Bakhtin 於 1946 年 11 月 15 日出席莫斯科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院（Gorky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in Moscow）的博士論文答辯場合中，曾對於源自於古希臘羅馬語藝歷史的中世紀詼諧（medieval laughter）之特質與政治性，有相當系統性的說法。順著 Bakhtin 的論述理路，我們似乎有機會逐步窺見眾聲喧嘩作為倫理實踐的語藝觀。以下這段引文是本研究對 Bakhtin 當時說法的節錄：

（一）詼諧具有普遍的（universal）意義。詼諧並不侷限於私人的、負面的、卑賤的事物。相反地，絕對真理亦可能是詼諧的，任何事物都可對詼諧觀點敞開心胸，……包括所有那些崇高的、神聖的、嚴肅的事物。

（二）詼諧的本質總是曖昧多義的。在中世紀詼諧中，負面與正面的背反事物總是融合在同一個整體之中。詼諧亦總是與時間（time）產生有機連結；……因此，詼諧總是與生成（becoming）與變遷（change）緊密相關，包含過去、現在、未來。基於這個理由，詼諧總是既破又立的……。

（三）詼諧是本能的、天性的、物質性的。詼諧的核心意象系統即是物質／身體生活（material/bodily life）。……物質身體低下部位讓每件事情世俗化、肉體化、脫冕化（decrown），就像聖文諧擬（sacred parody）的功能一樣。……同時，以物質身體形象之名，身體之死和新生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

(四) 詼諧與民間對於自由和真理的理解密不可分。中世紀詼諧徹頭徹尾乃是非官方的 (unofficial)，但它同時又是合法的 (legalized)。狂歡節的詼諧暫時懸置了真實、懸置了官方系統中所有的禁制和階層藩籬。(Bakhtin, 2014.07: 7-9)

Bakhtin 上述的說法在口試現場引發了相當大的迴響，當然也引起不小的喧嘩與批評。批評者或主張不是每個詼諧都具有民間智慧或基進批判，有些詼諧僅是扮演娛樂的角色；或者認為 Bakhtin 僅用官方 vs. 民間文化這兩種文化的對比來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舉證似乎不夠充分；另有批評者在發言中懷疑所謂的曖昧多義性是否真的存在，而過度訴諸身體低下部位的行動力是否低估了階級鬥爭存在的事實 (Bakhtin, 2014.07)。^[4] 面對這些批評，Bakhtin 在答辯的最後，陳述自己透過小說話語的詼諧和多音，企圖指出一個新世界的存在。這個新世界在小說理論的發展系譜裡，直指源自於古希臘羅馬的詼諧，在創造「首要的批判性蘇格拉底意識」(first critical Socratic consciousness; Bakhtin, 2014.07: 31) 時具有重要位階。事實上，我們從 Bakhtin 在其他諸多論著中提及蘇格拉底對話的字裡行間和書寫脈絡可以清楚知道，Bakhtin 這裡試圖陳述的，與柏拉圖晚期在對話錄中呈現的辯證語藝觀具有高度的指涉性。

以下，本研究嘗試歸納眾聲喧嘩觀點的倫理向度，並透過與柏拉圖進行微型對話，勾勒 Bakhtin 的語藝觀。

首先，本研究主張 Bakhtin 眾聲喧嘩的倫理向度具有反個人唯心論的特質。因為無論是古希臘羅馬文藝創作中的諸多詼諧化的儀式特性和文學書寫風格，或是中世紀詼諧不該被理解和侷限在私人個體領域中的直接呼籲，我們皆可看見 Bakhtin 對於過度強調個體主觀意識的思想路數是抱持著戒心的。易言之，Bakhtin 眾聲喧嘩的觀點所指涉的不同話語意識的發聲、對話乃至於雜交纏繞，並非來自於個別語藝言者的個人意志或率性而為；相反地，眾聲喧嘩所訴諸的個體人類自由乃是透過與外在／他人話語持續參照和對比，才得以成就其整體。這裡，論者指出 Bakhtin 的眾聲喧嘩觀點明白地拒斥了「倫理上的唯我論」(ethical solipsism; Gardiner, 2012: 54)。

對於倫理唯我論、唯心論的立場態度，在柏拉圖的語藝觀中其實是一個相當耐人尋味的議題。一般認為柏拉圖「以真理為先」的語藝觀（楊克勤，2002：44）以及他主張真理存在於形而上層次且具有恆常穩定性的主張，透露出極為理想主義／唯心論的哲學語藝觀（Foss et al., 1991／林靜伶譯，1996：63-70）。然而這裡必須澄清的是，柏拉圖縱使相信穩定真理的存在，但他也同時主張追尋真理的方法，必須透過辯證的語藝。柏拉圖相信一個人必須去諮詢、探究、測試或經由辯證法論證，而不是單單仰賴說話的技巧或諂媚之術，方能夠明白事實的真相並感動群眾（楊克勤，2002：36）。

承上，Harris（1998: 15）更指出柏拉圖在對話錄 *Phaedrus* 所呈現的蘇格拉底對話，其實有著相當 Bakhtin 式的對話性。因為 *Phaedrus* 中對於對話互動中「誰在聽？」、「誰在被陳述？」的複雜鋪陳，正是 Bakhtin 眾聲喧嘩觀點極為重視的研究範疇。Harris 進一步指出，*Phaedrus* 中至少有兩個蘇格拉底，一個是柏拉圖虛構、想像的蘇格拉底，另一個乃是柏拉圖自己。透過蘇格拉底之口，對話錄中清楚召喚、邀請了蘇格拉底所敵對的智辯士語藝，並在 *Phaedrus* 的對話情境中不停地與之周旋詰問。

整體來看，本研究認為 *Phaedrus* 確實再現了 Bakhtin 所述的眾聲喧嘩的觀點。因為在蘇格拉底對話中，「作者聲音乃是諸多先前聲音的蒸餾淨化」（Harris, 1998: 18）。而無所不在的柏拉圖聲音更彷彿是唱詩班裡的後設言者（meta-speaker），靈活穿梭於不同話語意識和語藝實踐之間。據此，本研究主張眾聲喧嘩透過拒斥倫理學上的唯我唯心論，架構出一個視對話詰問為必然存在的語藝觀。其中，語藝言者必須肯認並且正視「語言早已為他人的居所」（Bakhtin, 1963/1984: 202）此一事實，眾聲喧嘩的語藝才得以豐富鋪張、深刻複雜地體現對話詰問的動態樣貌。少了這點，眾聲喧嘩語藝的辯證性將無法想像。

其次，本研究主張 Bakhtin 眾聲喧嘩的倫理向度，另有反階級化約的特質。當 Bakhtin 以相當大的篇幅不斷舉證古典到中世紀的諸多語藝展演如何展現挑戰正典與既定規約的語藝動能，甚至得以暫時懸置階級藩籬或社會禁制的壓迫和不自由，我們得以肯定眾聲喧嘩對於國家暴力和語言暴力乃是高度敵視對立的。對此，Bakhtin 研究者直指重塑

階級意識、確立烏托邦革命主義，亦是眾聲喧嘩作為倫理實踐的擘畫藍圖（Gardiner, 2012: 59, 2013: 76）。

然而這裡值得思辨和警覺的是，縱使當代語藝觀點對於語藝本質的界定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主張（例如：以「意義」、「認同」、「實質共享」擴大「說服」的光譜和定義；見 Burke, 1969），語藝的本質畢竟仍以說服為本、以倡議（advocacy）為務。當語藝有可能被當成主流階級鞏固其既得利益的工具時，Bakhtin 對語藝提出了相當負面的批評：

在語藝中，存在著絕對的清白無辜和絕對的罪大惡極；語藝以贏得勝利、瓦解對手為本，這意味著語言世界中的對話場域將被語藝消解破敗。即便在古希臘時期，對話的場域都未曾存在。（Bakhtin, 1979/2004: 150）

語藝學者 Jasinski（1997: 24-28）更羅列出 Bakhtin（2002c: 266-268）在“Discourse in the Novel”一文中，對於語藝的挑戰批判與立場至少有以下四點：（一）語藝展演是獨白的、已了的；（二）這是因為語藝倡議旨在尋求大獲全勝，所以倡議必然是種權威語言；（三）由於倡議「是種純然的工具性與全然的實際行動」，所以倡議無法參與社會的眾聲喧嘩，也因此不得被視為一種事件（event）；（四）以贏得勝利為目的之導向直接連結到語藝言者個人的權力，並排除了「小說意識」（prosaic consciousness）的發展空間。綜上，Jasinski 認為當語藝僅作為一種工具和目的，將使其和眾聲喧嘩與複調之間的連結被斬斷了。語藝因此不再得以生產社會世界的多樣性與眾聲喧嘩，而流於權威獨白主義。

事實上，Bakhtin 上述對於語藝的批判並不甚公允。語藝學者 Halasek（1998: 102）就認為 Bakhtin 對語藝的定義「跟我們有所不同」，因為 Bakhtin 忽略了語藝雖然易為人基於私利所操弄操作，但語藝在自由多元論的當代社會中更多時候乃是跟離心、顛覆的力量加以結盟。對此 Halasek（同上引）指出，語藝應該至少有兩種，一種是替主流文化代言的爭辯語藝（polemic rhetoric）；另一種是回應霸權文化的諧擬

語藝 (parodic rhetoric)，後者不但展現出語藝本身所蘊藏的意義顛覆性，更與 Bakhtin 眾聲喧嘩觀點的烏托邦色彩十分接近。因此 Bakhtin 對於語藝的貶抑太過偏頗了。

除了上述 Halasek 試圖為 Bakhtin 所批判的語藝提出辯護，另有語藝學者指出，Bakhtin 在論及其眾聲喧嘩的語藝觀時，存在著多處的立場矛盾：當語藝跟「小說」相提並論時，兩者被高度標榜為民主自由的體現；當語藝等同於「詩語」時，語藝將生產出封閉僵化、既定已了、官方權威的意義系統 (Jasinski, 1997)。Jasinski (同上引：266) 得到的結論是，Bakhtin 在批判語藝時，沒有看見語藝展演和語藝實踐在「既定已了」和「未定之天」之間擺盪游移的內在張力；亦即語藝雖有煽動人心的可能和傳統，但語藝之所以是語藝，乃是因其必然替更多的語藝「維繫論述審議的空間」。

針對上述對於語藝角色和其工具目的性的爭議，本研究認為比較持平的理解，應如同 Murphy (2001) 所述，Bakhtin 的眾聲喧嘩觀點應試圖或傾向懸置語藝的「工具性」(instrumental aspect of rhetoric)，以及語藝為特定人士操作掌控 (manipulation) 以倡議權威話語的說服性。從這個立場出發，我們確實發現 Bakhtin (2002c: 269-279) 曾大力盛讚過語藝對生活多樣性 (living diversity) 和言者聽者互為主體、積極回應彼此的關注，對眾聲喧嘩的觀點具有啟發性的意義，而他反對的是跟詩學等向心力結盟的「形式主義語藝」(formal rhetoric; 同上引：267)。簡言之，以反階級化約論為經，反語藝工具論／操控論為緯，Bakhtin 對於語藝與眾聲喧嘩的關係，乃是樂觀正面的。

另外，反工具性、反操控性的眾聲喧嘩語藝觀，在懸置社會既定的階級劃分之際，也遙遙呼應柏拉圖對於智辯士語藝缺乏對真理的認識，僅在意如何在法庭上用雄辯術辯倒敵人，乃極大之惡的道德批判 (Herrick, 2009: 63; Murphy et al., 2014: 33)。當語藝僅在意如何以非黑即白之諂媚術駁倒對手並阻礙對話交流時，語藝不但枉顧了柏拉圖語藝觀對真理正義的追求，更與 Bakhtin 的眾聲喧嘩觀點背道而馳。而當語藝不以「結果」和勝利為首要考量，且試圖在組裝社會世界中的諸多話語意識之際，肯認語言意義的變動性以及批判霸權的有效性，語藝作為行動的正面力量 (Murphy, 2001: 259) 以及對話語藝 (dialogic

rhetoric) 在具體的語藝行動中回應、諧擬霸權文化的可能性 (Halasek, 1998: 102) 才得以實踐。這裡, Bakhtin 眾聲喧嘩的語藝觀一方面指陳了語藝倡議在單向說服中的有限性 (因為在眾聲喧嘩的語藝中, 單音獨鳴或權威話語的說服力將逐漸遞減), 另一方面亦直指語藝倡議作為政治行動的有效性 (亦即眾聲喧嘩的語藝在辯證對話和諧擬表述中, 具有批判霸權階級以建構烏托邦的潛力和可能性)。

透過詰問的必要性、倡議的有限/效性, Bakhtin 依序表述了眾聲喧嘩語藝的辯證性和烏托邦色彩, 及其對應的反個人唯心論、反階級化約論的倫理向度。這裡仍值得繼續提出的是, 眾聲喧嘩的倫理向度, 尚有一種復興俗世知識的特質。不同於柏拉圖在 *Republic* 一書中期望一位「哲學家皇帝」降臨人世統治理想國 (轉引自 Murphy et al., 1995: 23), 或是真理「存在於上帝靈性中」 (Golden et al., 2010: 55) 因此語藝必須「取悅神明」 (楊克勤, 2002: 38) 的主張, Bakhtin 從庶民文化大量取材並高度仰賴於文化正典中被視為汙穢不堪的身體低下部位, 直白地論述其具有的解構舊思維、創造新意的天性本能或倫理承擔。這裡我們可以說, 在 Bakhtin 的眼中, 重塑社會秩序和政治系統的眾聲喧嘩倫理向度如何憑藉血肉之軀的存在事實而加以實踐, 更為其縈繞於心的命題。眾聲喧嘩透過俗世知識復興以示現語藝行動的策略性, 亦是 Bakhtin 語藝觀的涵蓋範疇。

Bakhtin (2002a: 67) 指陳, 在獨白主義興盛的年代, 語言產生了集中化的趨勢。然而我們同時在庶民文化中, 看見諧擬嘲諷的文藝創作同步地興盛繁榮、眾聲喧嘩。眾聲喧嘩所保留的不同話語意識和語藝實踐持續鬥爭抗辯的語藝歷史, 如何持續在話語階層化 (stratifications of language) 中具體化, 並實踐眾聲喧嘩語藝的詰問必要性、倡議有限/效性與行動策略性, 已是接下來不得不談的主題。由於眾聲喧嘩的倫理向度和語藝觀早已超越了文本內在意義形塑的範疇, 且具體旨在外在世界的語藝改造, 以下, 本研究將從外在對話性的觀點, 就眾聲喧嘩作為倫理實踐進行語藝學的理论建構。

參、眾聲喧嘩即倫理實踐：外在對話性的觀點

Bakhtin 的語藝觀，旨在陳述語藝言者間透過詰問的必要性、倡議的有限／效性、行動的策略性，積極實踐眾聲喧嘩觀點的辯證性與烏托邦色彩。然而過去的相關研究多半僅就 Bakhtin 日常性語言的內在對話性進行探討（見王孝勇，2013）。這雖然是 Bakhtin 一貫持續書寫的問題意識，但是，若我們無法洞悉語言指向外在世界的外在對話性或超語言學（translinguistics；Bakhtin, 1963/1984）範疇，乃至於話語意識如何透過內在自省（introspection），進而對外體現其獨特且不可話約的語藝意識以進行政治社會的改造，則眾聲喧嘩的倫理實踐將難以為繼。更有甚者，Bakhtin（2002a；亦見 Vološinov, 1929/1986）對於語言因其詼諧性與多音性而具有意識形態鬥爭潛力的主張，恐也流於空談。

事實上，Bakhtin 並沒有輕忽語言的外在對話性，只是相關的書寫篇幅確實較少（且在學術市場上被關注和討論的方式較不直接）。一般認為 Bakhtin 在其最接近方法論（methodology）的研究專著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Bakhtin, 1963/1984），所討論的複調小說中作者與主角、言者與聽者透過外在對話性重塑話語階層的說法，相當程度的就眾聲喧嘩的倫理實踐提供了語藝資源（亦見 Bakhtin, 2004: 34）。而這部分的討論，建立在與獨白小說的作者與主角關係加以對照比較的基礎上。

一、眾聲喧嘩語藝的話語階層化

Bakhtin（1963/1984: 80-81）首先指出，在獨白小說的世界中，思想（idea）是種根本的唯心論。這裡所說的唯心論體現在對話中，是種教學法的對話（pedagogical dialogue），亦即有一個認知者扮演權威的角色，負責傳遞知識給另個無知者，像是老師教導學生一樣。歐洲的理性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啟蒙運動都是信奉這種唯心論。Bakhtin（同上引：82-83）並且進一步指出，唯心論因其僅承認某種單一穩定的先驗真理，所以阻礙了對話中主體意識的存在，更將小說中的作者思想無限上綱。而獨白小說的作者思想，具有三種特性：（一）它是觀察和描繪世界的原則，是選擇和組織材料的原則，是單一腔調與

單一思想背後的原則；（二）它是自材料中演繹而來的定見；（三）它會直接表現在主角的意識形態立場中。在作者思想統御一切的獨白世界裡，故事中的主角僅是服膺於作者需求的對象或客體。他無法從作者宰制和權威中逃逸而出，成就其主體性。托爾斯泰的小說即是 Bakhtin 眼中最具獨白性的範例。

不同於獨白小說中，作者與主角間的關係呈現出一種僵化、單一、線性的穩定對應和從屬關係，Bakhtin 直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是種複調小說，其中的話語形象（image）和主體形象，不但具有根深蒂固的動態性、未了性，更具有外在性。

首先，Bakhtin 指出複調小說的主角，是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思想家。主角話語乃是一種「外在性的主體位置」（Morris, 1994: 97），^[5] 體現了一種獨特具體的自我觀點與世界觀：

「主角」對於杜思妥也夫斯基而言，並非意味著某種固定的、特殊的社會典型特徵或個人人格特質之真實，也不是一種結合許多明確、客觀特質且能夠回答「他是誰？」這個問題的特殊描繪。杜氏感興趣的是主角作為一個「特殊的對世界與對他自己的觀點」，以及主角作為一個能夠去詮釋和評估其自我與其週遭真實的主體位置。所以，對杜氏而言，重要的不是他的主角如何在世界中展現，而是世界如何呈現於主角的面前，以及主角如何呈現自己。（Bakhtin, 1963/1984: 47）

上述文字清楚呈現出，複調小說中的主角雖然是作者創造出來的聲音腔調，甚至是一個虛構的存在，卻被視為一個觀點、一個對世界與自我的看法。Bakhtin（1963/1984: 59）在此進一步強調，複調小說中的主角是具有自我意識的主體，而其自我意識的打造運作過程充滿了對外在世界和其社會位置的不斷自省，並嘗試挑戰所有強加於其身上的規範與權威話語。在此，所有自我定義、自我封閉、自給自足的文本意義得以全然瓦解，而轉化為動態未定之境（unfinalizability）。

那麼，複調小說的作者又扮演著何種角色？Bakhtin（1963/1984: 63）指出，複調小說肯認主角話語的獨立性，並非意味著作者立場的

缺席或棄守，而是作者立場的根本改變，亦即作者「認真實現、徹底貫徹了一種對話立場」。Bakhtin 說（同上引：63-68），作者在展現其自我意識之際，會充分感受到在其旁邊或面前，存在著與自己意識平等的他人意識。而作者並不會將他人意識轉變為客體，也不會給予他人意識最終的定義。作者會做的乃是將他人話語視為一個平等與對等的語意立場（semantic position）和觀點，在保持其論述獨立性之際與其親密接觸。在此，話語真切體驗並操演了外在對話性，因為作者透過對他人話語意識的肯認，得以進一步操演一種蘇格拉底對話或柏拉圖辯證法的「啟發性問答法」（maieutic；Gardiner, 2012: 64），並以眾聲喧嘩所交織的意義互動性作為下一階段諧擬外在世界既定規範的語藝資源。這裡，透過外在對話性，所有的話語也都成為了雙聲表述（double-voiced utterance）或腹語術（ventriloquism），其中充滿了不同情意、語藝意識和意識形態的激盪、迴響，甚至是鬥爭、衝突。複調小說中的每一個人更成為了「人中之人」（the man in man；Bakhtin, 1963/1984: 58），因其身上總是完整再現了外在／他人的話語意識和世界觀。

從 Bakhtin 所想像的複調小說中作者和主角的關係出發，我們可以說 Bakhtin 所想像的眾聲喧嘩的語藝，具有多重中心性（multi-centeredness）傾向。亦即言者的立場、判斷、意識形態雖然總是在場，但僅是相對性、有限度的而非權威性。言者在表述時所處的乃是一個持續對話的主體位置，他積極朝向聽者、他人的聲音腔調，且無私地允許他人表述亦具有相當的話語主體性和整體性，以再現特定的自我意識和世界觀。這裡 Bakhtin 對於語藝倡議的說服力，其實是相當謙卑保留的；亦即語藝實踐並非對他人說法的變造扭曲以贏得政治權威，而是建立對外觀點的創造性理解（Murphy, 1997: 85, 2001: 272）。我們甚至可以說，眾聲喧嘩在意的是對話互動的過程，而非僅關注語藝實踐的結果或後果。

此外，言者自身的觀點或思想在表述的同時，亦化身為一個體現外在世界的話語形象，據此作為眾聲喧嘩中的其中一個聲音腔調，和眾多話語意識中的其中一個話語。Bakhtin（1994b: 89-90）對此陳述，複調小說和眾聲喧嘩是一個自主主體所存在的互為主體的（inter-

individual, inter-subjective) 世界。在互為主體、互相交錯與重疊而非一者排除他者的語言場景中，一種全新的話語階層化得以被創造。它是一種水平並存的世界觀，得在聲音干預 (voice interference) 的同時向所有最終化的封閉意義系統提出質問。在此，眾聲喧嘩的倫理向度與詰問的必要性更緊密地接合扣連，並在日常性語言的語藝實踐中持續地實踐其政治社會改造的動力。

綜上所述，本研究尚有以下幾點延伸討論，而近來台灣諸多重大之社會議題，則提供了本研究論述的基礎。首先，本研究發現，Bakhtin 透過複調小說的作者與主角互動，試圖呈現出的不僅是一個話語意識間彼此積極互動、對話交流的世界，更旨在透過此一世界所提供的文本空間進一步將充斥於其間的情意、意向、判斷、價值觀「對外」接合到一個整體性、動態性的話語階層平台，並與階層外的封閉意義系統和教條主義互相對立。對此，在 2013 年台灣的多元成家草案所引發的爭議中，無論是支持者以「任何人（而不只是同性戀者、跨性別者）若想組成家庭，願意相互照顧、共同生活，應該在法律上給予一定權益的保障」（舒子榕，2013.11.10: A6）為訴求，或是反對者（例如：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宣稱傳統一夫一妻制「最符合台灣全體國民的整體利益」（中國時報，2013.11.04: A6），論辯雙方皆試圖將其內在立場外在化為特定社會群體的集體利益或對話共識，據此與外在世界的他人表述進行詰問或對峙。這裡，Bakhtin 所述複調小說所呈現的言者、聽者關係在呼應了眾聲喧嘩倫理實踐的辯證性之際，如何形構其作為語藝言者的主體性，有待更細緻的討論。

其次，本研究指出，從複調小說強烈反對獨白封閉的最終定義並頌揚意義的未了性與開放性中，我們亦可發現 Bakhtin 透過語言所反思的人類存在和外在世界樣貌，不但拒斥所有公式化的真理和格言式的命題，更透過每一個語藝言者冥思苦想後的自白和表述不間斷地與外在世界的終極權威周旋頡頏。這裡，Bakhtin 流露出的對於差異 (difference) 的歡迎和慶賀，確切呼應了眾聲喧嘩的烏托邦色彩、社會政治效應和語藝動能，並直指語藝倡議具有如是的有限性和有效性：每一個語藝言者的語藝實踐都在傾聽他者、回應他者之際建立解構和批判的能動性。在此，眾聲喧嘩語藝所呈現的語藝意識如何可能？除

了值得更細緻的理論推敲，我們在台灣法律是否廢除死刑的論辯中，亦清楚看到正反雙方在「法律如何提升人民安全感」的前提下，分別從「廢死乃保障人權」vs.「執行死刑乃多數民意、司法正義的表現」（劉世怡，2014.04.29）等對立的角度進行倡議。這裡，無論是人權、民意或司法獨立，皆似乎逐漸開始成為有待被界定其範疇的相對化知識類目，而非亙古不變的權威典律。

最後，本研究亦發現，**Bakhtin** 曾經明言在複調小說的外在對話性和眾聲喧嘩的民主動力之中，必須存在著一個主導的思想。這個主導思想並非獨白文本中的先驗理論法則，更非外在於語境或生活世界的絕對真理，而是一個經過淬鍊後的嶄新話語形象。**Bakhtin**（1963/1984: 98）將這樣的話語形象比喻為「犯了過錯的基督」。他意味著在剔除不可侵犯的神性和權威之後，思想、形象和話語意識反而能彰顯出有血有肉的真實人性與人生。這裡我們再度看見 **Bakhtin** 眾聲喧嘩語藝所訴諸的俗世知識，在複調小說話語中得以被進一步地轉化為倫理實踐的資源。而眾聲喧嘩語藝對俗世知識的標榜，更策略性地展現在台灣 2013 年初核四公投運動的諧擬語藝或爭辯語藝中。除了反核團體以居住正義、永續環境的主張宣稱停建核四的迫切性、必要性和民意基礎，即便連宣稱「貿然停建核四是違憲」（蘋果日報，2013.03.16: 1）的官方聲音，亦必須承諾會逐步減少對核能的依賴並確保核安無虞。此舉乃是避免承擔民意向背的政治風險。

然而，**Bakhtin** 所說的嶄新的主導形象從何體現？他何以將所有既定已了的意義系統和社會規約相對化，以實踐眾聲喧嘩的倫理？如果來自古希臘羅馬民間傳統的諧擬表述得以創造多音，並據此建構了眾聲喧嘩語藝的詰問性、倡議性，什麼樣的諧擬（parody）才得以作為倫理實踐的行動策略，並透過語藝言者的語藝行動展現動能？^[6] 對此，本研究指出，後結構主義者 **Butler** 對諧擬展演表述觀點，對言者與外在主流社會文化脈絡中的仇恨語言（hate speech）持續攻堅抗辯的討論，相當程度延伸了 **Bakhtin** 的眾聲喧嘩觀點，並在眾聲喧嘩語藝的話語階層化之基礎上，持續從外在對話性的角度提供眾聲喧嘩語藝的行動策略。這部分的討論是 **Bakhtin** 較未言明的理論空缺。而透過對 **Butler** 的引介參照，我們得以清楚地回應上述對於眾聲喧嘩即倫理實踐在主體性形構、語藝意識打造和語藝動能體現上的提問思索。

這裡必須加以說明的是，雖然一般認為 Bakhtin 的思想體系和哲學立場比較接近康德，但又試圖淡化康德思想中的歷史先驗性，並從「自我如何認識他者、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過程」（劉康，1995：81）來思考人類主體性，是為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它絕非黑格爾式的辯證法意圖到達最終穩定的事物狀態。而 Butler 的立論基礎乃是建立在黑格爾哲學的重新閱讀和梳理，與 Bakhtin 似有根本的差異。但是，本研究認為，Butler 一系列的書寫縱是本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但藉由訴諸主體性建構乃是存在於社會規約或強迫性權力關係本身的縫隙，以及在意義運作過程中一再持續地挑戰既定規約等主張，早已揚棄了黑格爾式辯證法所預設的最終穩定性。Butler 藉此陳述的語藝意識，及其對於意義不穩定性與顛覆性之強調，一方面呼應了 Bakhtin 眾聲喧嘩的倫理向度和語藝觀，另一方面則延伸了眾聲喧嘩的話語階層化主張，並就其作為倫理實踐的外在對話性提出行動策略的規劃。

二、眾聲喧嘩語藝的諧擬展演性

Butler 的諧擬展演，乃是建立在其對 Austin 語用論和 Althusser 意識形態召喚論的重新閱讀與反思。透過這樣的反思，Butler 試圖說明仇恨語言（亦即 Bakhtin 所說的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中的權威話語或他人／外在表述）所體現的社會文化規約，如何具有傷害性（vulnerability）並形構言說主體的主體性，而主體又如何鬆動語言中的暴力並展現語藝動能。

Butler（1997a: 44）首先指出，Austin（1975）在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一書中，將言語行動區分為「表意的」（illocutionary；指藉由話語所實踐的行動）與「遂意的」（perlocutionary；指話語所實踐的效應），並傾向從後者來談論人如何利用語言做事，有種將語言工具化的疑慮。因為這樣的觀點把語言僅僅視為完成行動的工具，而「語言」與「透過語言所完成的行動」之間則被切割開來。此外，Butler 還指出，遂意的語用論為了說明語言何以產生特定的效應，於是預設了一個深思熟慮的語藝言者先於語藝行動之前，主宰了生活世界中所有的話語實踐。這樣的觀點不僅流於先驗性，更有一種「單一主體」的

迷思，亦即相信某一個權威的言者其話語行為可提供對特定事物完整的、最終的說明。在此，單一主體就像是法律或國家主權，具有無上的權威去生產和界定仇恨語言和社會規約的範疇。^[7]而仇恨語言的建構，則反映出單一主體（例如：主流文化脈絡的「共識」）如何透過語言來再現某種將特定群體貶抑為從屬階級，並遂行歧視的政治。

在此，Butler（1997a: 6）視語言為一個行動或一個具有某種結果的行為（an act with consequences）。她主張雖然在語用學中表意和遂意是兩個不可分割的層面，但為了避免遂意語用論恐有將語言既定化、工具化、單一化之虞，採取表意的觀點，應較能確切思考人與語言之間不可分割的動態關係，以及特定意義系統與優勢意識形態之間的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因為表意的語用論將語言帶出工具性的狹隘範疇並賦予其行動力，使語藝言者得以透過特定的語藝行動展演（國家的）論述權力（discursive power）並將其諧擬嘲諷。從這個立場分析仇恨語言，Butler 在意的不僅是語言的傷害性如何戕害主體，更是語藝言者得以透過何種語藝行動策略來解構仇恨語言，並在從屬的同時策略性地展現其主體性和其語藝意識的能動性。

其次，以 Althusser（1994）所述的路人回應警察的召喚“Hey you there”而成為主體的場景為例，Butler（1997a: 2）指出語言本身是種命名。所謂的命名，意指主體妥協且依附於社會禁忌（attachment to prohibition）並藉此獲得社會身分。而仇恨語言乃是因應社會約定俗成而來。因此其過程與命名過程亦同時將暴力與傷害性滲透於主體之中，並產生排除他者的實質效應。^[8]

然而，不同於 Althusser 似乎在意識形態召喚論中假定一個使主體得以回應以獲得社會存在的先驗聲音，Butler 認為主體的召喚並非單純地為權力先驗性服務的語言效應，主體更不是 Austin 所說的與語言維持著工具關係的主權行動者。Butler（1997a: 26）直指，若要構連 Austin 與 Althusser 的理論觀點並重新演繹仇恨語言運作與主體形構的關係，必須提供一個關於「主體如何透過依附於大寫他者以建構主體性，然後成為能夠去表述和陳述他者的主體」之語藝理論，據此才得以進一步想像主體的能動性與行動力。^[9]如同以下的宣稱：

我所思考的語言學場景，乃是主體處於陳述他人與被他人陳述的關係中。在此關係中，陳述他人的權力源自於被他人陳述，而語言中的某種主體性，乃是藉由其顛覆性而成為可能。
(Butler, 1997a: 30)

上述文字一方面透露出 Butler 的語藝觀，亦即語藝行動不僅是在實踐中發生，語藝本身亦是一個儀式性、顛覆性的政治行動；另一方面更對應性地指涉到 Bakhtin 所述之眾聲喧嘩語藝的詰問必要性。如果 Bakhtin 眾聲喧嘩的觀點試圖交待語藝透過詼諧性和多音性，具有召喚過去、呼應當下、指向未來的特性，到了 Butler (1997a) 的說法裡，對話主體依境而生、詰問他人的特性更被進一步論述為：語藝言者總是必須透過召喚和回應（他人陳述）而成為語言主體並獲得社會身分，而這個社會身分所伴隨而來的主體性形構乃是策略性地、暫時性地從屬於規約並伺機而動的。這裡，Butler 已超越了 Bakhtin 眾聲喧嘩倫理的諸多初探性想法，並直指眾聲喧嘩語藝動能的意識形態鬥爭性，就是外在對話性的重要依據與行動方案。

承上，本研究進一步發現，Butler 所說的社會規約對主體性形構的管控和限制並不全然是負面的意涵，因為語藝本身所蘊藏的顛覆性亦被 Butler 特別加以強調。對此 Butler (1997a: 22) 進一步指陳，語言的傷害性乃是曖昧多義的，而在主體妥協於命名和召喚之際，也可能從傷害中得到能動性和反抗的依據。亦即，在並不存在單一主體能依其意圖意志以統管所有言說行動的前提下，言者得以透過回應先前話語的召喚，重複 (reiterate) 引述仇恨語言的儀式成規，以瓦解其傷害性。這即是 Butler 所說的諧擬展演。它值得延伸探討如下。

首先，我們從 Butler 所述的妥協和顛覆一體兩面的討論來看，不難發現她在重述 Althusser 意識形態召喚論時，試圖突顯的乃是 Althusser 曾經提及但並未加以充分理論化的一些說法，例如：「在意識形態內與意識形態決裂」(Althusser, 1994: 86)、「創造新的意識形態取代舊的」(同上引：72)。而透過接合 Austin 語用論並將語言視為具有某種效應的行為，Butler 直指語言本身即具有指向外在的社會政治效應，而語藝實踐的意義顛覆性和展演性更是瓦解仇恨語言的核心。

這裡，Butler 對於諧擬展演性的討論，直接陳述了語藝主體如何在眾聲喧嘩所揭櫫的辯證性之際建構其主體性與解構批判性。

其次，由於 Butler 所述的仇恨語言的解構，並非訴諸一種全然棄置或分離主義的行動策略，而是試圖在重複引述社會規約之際暴露其偶然性與暴力，因此語藝言者在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中所處的主體或從屬位置，乃是一種暫時穩定的戰略位置。正是在這個戰略位置上，語藝言者在與下一個話語意識對話交錯和引述挪用之際所展演出的表述、價值觀、聲音腔調、自我意識，才具有批判既定規範的力道，而不流於個人唯心論或瑣碎化。這裡我們可以說，Butler 的說法除了呼應 Bakhtin 所指陳的主體意識唯有在引述和挪用他人話語意識的過程中才得以型塑之說法，更有助於重新想像並理解 Bakhtin 所述的不同話語意識同時並存、持續諧擬的眾聲喧嘩語藝場景，並對眾聲喧嘩語藝的多音性何以做為解放與烏托邦實踐之先決條件和情境脈絡，提供了適切的回應。這裡，眾聲喧嘩的語藝意識即是 Butler 所述的諧擬展演性。而透過「再意義化」（resignification），Butler 示範了諧擬展演性的語藝實踐：

言說行為之所以能夠將原初語境再意義化，乃是因為「表述的原初情境或意圖」與「表述所生產的效應」之間存在著斷裂與不連續性。這意味著言說行為具有開放的暫時性，使得某些言說行為與其效應之間的確定性瓦解。而鬆開了行為與傷害之間的連結關係，同時也開啟了反動言說（a counter-speech）建構之可能性，那是種說回去（a kind of talking back），是在此連結關係未被鬆開之前所不存在的。（Butler, 1997a: 14-15）

以上述說法為基礎，Butler 直指諧擬展演性就是種重新設定（restaging）或錯誤挪用（counter-appropriation）的再意義化。它主張仇恨語言的傷害性效應必定與言說行為的起源、情境、意圖、原初部屬連結在一起。而在重複引述仇恨語言的話語實踐歷程中，言說主體得以藉由梳理（而非迴避）仇恨語言如何在特定的語藝歷史中累積與

掩飾其暴力本質，並且不斷地質疑每一個既定話語所召喚的社會成規與僵化教條。在此，所有的意義系統都不具有歷史先驗性，而僅是立基於特定的體制條件中的社會成規引述和偶然性。而仇恨語言雖然透過霸權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掩飾和累積，部署於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並遂行其傷害性，但解構和再意義化正座落於語言的傷害性以及辯證法之中。據此，語藝言者得以透過重複引述的語藝行動逐漸辨識語言的傷害性，並進一步將社會成規引導到另個脈絡中加以諧擬嘲諷。這個語藝實踐最終將展演出主流政治社會的歷史偶然性與任意武斷性，這即是眾聲喧嘩作為倫理實踐的旨趣。

對此，與 Bakhtin 從身體談論社會規範的銘刻和挑戰有些類似，Butler (1997a: 10) 直指「語言本身就是一種身體行為」。^[10] 透過批判性地檢視身體界線如何系統性地被社會禁忌所指涉，Butler 對當代認同政治與性別論述得以從一個非本質論的批判基礎進行政治干預，並重新形塑性別的話語階層的說法，或許可作為眾聲喧嘩倫理實踐的行動策略參考：

身體並非一個靜態的存在，而是不停變動的場域。性別化的身體是「血肉之軀的風格」(styles of the flesh)。但所謂的風格並不是全然自我風格的，而是有其歷史，歷史限定、限制了風格的可能性。以性別為例，性別是身體的風格，是種有意圖的展演行為，而展演一詞意指意義建構的戲劇性與偶然性。(Butler, 1999: 177) ……性別因此是被建構而來的社會暫時性之產物，轉變或顛覆的契機則在性別行為的任意關係中，在藉由諧體的重複以暴露出身分是種政治建構之中。
(同上引：179)

綜上所述，本研究指出，Butler 的諧擬展演和 Bakhtin 的眾聲喧嘩，在外在對話性的牽引指南下，至少在以下幾個面向上得以互相銜接，據以陳述眾聲喧嘩即倫理實踐並回溯性地就前文提及的眾聲喧嘩現象進行反思。

其一，就詰問的必要性與眾聲喧嘩主體性形構的角度而言，Bakhtin 明確指出不同話語意識的積極交流有助於打破彼此涇渭分明的疆界劃分，並瓦解權威教條主義。在此，每一個對話主體如何除清楚認知並區辨語言中的複調性與多音性，並在話語意識挪用之際展現自我意識與解構批判意識，乃是眾聲喧嘩倫理實踐的第一步。而 Butler 的諧擬展演所重述的語藝言者在主體性形構過程中，與仇恨語言之間既從屬又敵對的關係，則有助於開展出一種話語意識積極交錯且互相鬆動的對話關係與辯證法。在此，話語意識的挪用除了依循特定的語言形式或引述模式進行教條主義的解構和鬆動，更重要的或許是言者在對話中，對於自我與他者之間相對性與差異性的表述主張（Apusigah, Luce-Kapler, & Smith, 2002: 114）。對此，多元成家陣營透過訴求一種自主選擇的「伴侶關係」重新界定、區隔並轉化傳統建立在「血親關係」的家庭類目（廖子寬、王孝勇，2014.05），雖然必然擔負極為艱辛的「證明的負擔」（burden of roof），但至少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法推動上，似有機會在未來獲得具體的成效（聯合報，2013.11.15: A2）。多元成家陣營的相關訴求似乎也同步見證或體現了台灣性別文化的變遷。

其二，就倡議的有限／效性與眾聲喧嘩語藝意識的打造而言，Bakhtin 述及每一個話語都面對兩股背反力量的共存和鬥爭，並直指這兩股背反的力量得以實踐一種在差異中理解彼此，以積極尋求共識且又不替權威話語背書的倫理。而 Butler 的諧擬展演透過重複引述社會文化規約以解構絕對單一的認同，一方面化解了仇恨語言及其意識形態的先驗超驗性，並將其相對化為歷史的偶然；另一方面更帶給我們如是的啟發：眾聲喧嘩解構僵固認同、頌揚意義多元的烏托邦色彩，必須透過再意義化的錯誤挪用才得以實踐。就這點而言，反廢死陣營倡議東 vs. 西方不同文化脈絡的差異性，據此質疑人權語藝（human right rhetoric）於台灣社會的適用性，可能是其至今仍享有相對多數民意支持的原因。

其三，就行動的策略性與眾聲喧嘩語藝動能的體現而言，雖然 Butler（1999: 176）曾言明諧擬本身不必然是顛覆的。而什麼樣的展演在何處會翻轉社會既定規範的穩固性，本身即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Butler 並未對此直接回應。她僅僅主張諧擬展演的志業旨趣乃是去鬆動所有二元對立的階層化關係。對此，Bakhtin 對於複調小說重塑話語階層，並頌揚一種水平與多元價值自由存在的主張，不但肯認了每個對話主體不可化約的存在基礎和倫理承擔，更直接挹注了諧擬展演與再意義化的實踐指引。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反核團體的語藝動能應體現在將能源短缺、經濟停滯、電價漲價等官方警語，接枝和再意義化為長久以來政治體制對於一般民眾（包括被動接受核廢料儲存的蘭嶼人）的身體規約、政策強迫與暴力統治（黃力勉，2013.03.08: C2）。

事實上，Bakhtin（2002c: 284-285）曾經清楚地指出，在社會眾聲喧嘩中，對話的回聲必須滲透入語言的深層，使得語言本身產生階層互動，同時也使得語言背後的世界觀產生對話。而源自古希臘羅馬的民間文化並於中世紀發揚光大的狂歡節語言則是一個最具渲染力的案例。以上述討論為基礎，本研究主張眾聲喧嘩的倫理向度得以體現和實踐的依據，來自於眾聲喧嘩語藝在其外在對話性中所動員的話語階層化與諧擬展演性。

肆、代結語

一個人觀察事物的時候，盡量單憑理智，思想裡不攙和任何感覺，只運用單純的、絕對的理智，從每件事物尋找單純、絕對的實質——一句話，撇開整個肉體，肉體會干擾靈魂。

（Flower Trans., 1953 / 楊絳譯，2002：25）

以上這段文字是柏拉圖在 *Phaedrus* 中，透過蘇格拉底之口對語藝與真理的主張表述。這段文字不但彰顯出語藝所訴諸的理性理智開啟了通往（柏拉圖式的）真理之路，更試圖肯認語藝言者在面對現世紛擾乃至於眾聲喧嘩之際，仍不忘熱愛智慧、終於自我。這應該是本研究所探討的眾聲喧嘩觀點最原初也最具情意的倫理思索。

然而不同於柏拉圖超脫凡俗、棄置肉身的語藝觀，Bakhtin 眾聲喧嘩語藝所訴諸的，乃是既出世（烏托邦）又入世（辯證法）、既理想又務實的倫理向度（Gardiner, 2013: 65）。透過詰問的必要性、倡議的

有限／效性以及行動的策略性，Bakhtin 具體陳述了眾聲喧嘩語藝的外在對話性，並將語藝言者在對話鏈結中對他人話語意識的改編、變造、挪用、轉換直接賦予了解構與批判的身體／主體觀、語藝意識和語藝動能。再藉由進一步接合 Butler 的諧擬展演觀點，本研究發現語藝言者策略性地依附於語言中的社會規約，但又能伺機暴露既定社會文化脈絡的強迫性與暴力性，乃是實踐眾聲喧嘩倫理必經的語藝之途。在此，眾聲喧嘩即倫理實踐的主張，已非 Bakhtin 個人獨創的理論觀點，而更是與當代批判理論、文化研究、性別論述高度相關的語藝理論（Francis, 2012）。這個語藝理論不僅視語藝為環繞於在言者——聽者——語藝主題三者之間的動態運動（movement）或事件，更在意的是不同話語意識於當代頻繁交錯、互相攻堅、混雜纏繞、詰問倡議的語藝聚合性（polymeric nature of rhetoric；Harris, 1998: 15）和語藝動能。

語藝在爭議或事件並未定論已了、最終審判之前，提供論辯和對話的機會、空間與策略。這是自古希臘羅馬時期以降，語藝學所持續體現的知識特性。而眾聲喧嘩的語藝則進一步依循其倫理向度，透過辯證法與烏托邦的想像示現辨識多音、界定自我、諧擬權威、解構認同、瓦解暴力的俗民知識。面對當代台灣乃至於諸多民主化政體所面臨的語藝困境或語藝挑戰，眾聲喧嘩語藝其實提供了一個可供一般民主公民參照的倫理實踐。尤其是在面對當代諸多於公共領域提出之際並未即刻形成共識的議題，或爭議事件本身涉及多重價值觀犀利交鋒的語藝情境，不同語藝實踐如何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地進行論辯溝通、說服倡議、諧擬表述，甚或發展出具體的行動策略，我們應該提供更謹慎且深刻的批判基礎。

註釋

- [1] 在古典語藝的發展歷程中，柏拉圖與智辯士（sophist）之爭其來有自。柏拉圖早年因目睹蘇格拉底之死，曾於對話錄 *Gorgias* 中對語藝有極為直接且負面的指控。他批判智辯士語藝不相信穩定真理和正義的存在，只在乎如何以高價兜售說話的騙術技巧以影響扭曲陪審團的判斷，這是不道德的（Foss et al., 1991 / 林

靜伶譯，1996）。然而，一般認為柏拉圖之後在另一則對話錄 *Phaedrus* 中，一改過去對於語藝的負面主張，試圖提出自己的哲學語藝觀。透過蘇格拉底之口，柏拉圖清楚地將語藝與辯證加以扣連，並從辯證的（非線性）結構談論語藝如何幫助我們尋找事物的本質和真理（Golden et al., 2010；Herrick, 2009；Murphy et al., 1995；Murphy et al., 2014）。對此本研究認為，柏拉圖的主張雖然無法代表古典語藝的全貌，但他從批評語藝到重新肯認和界定語藝的範疇，某種程度和本研究關心的 Bakhtin 對語藝的思考路徑和語藝觀有些類似。Bakhtin（2002c）對於詩語（poetic language）流於先驗獨白的批判，也與柏拉圖反對語藝只是懷疑論者和享樂主義者所操縱使用以進行倡議說服的工具，具有相關性——雖然本研究對於柏拉圖語藝觀的理想／唯心論和超驗性仍有所保留。藉由與柏拉圖語藝觀的微型對話，本研究後續將勾勒出 Bakhtin 眾聲喧嘩的倫理向度，及其所體現的語藝觀。

- [2] Gardiner（2012）曾指出 Bakhtin 對於蘇格拉底對話與狂歡節詼諧的標榜稱頌，旨在與官方意識形態決裂。因為官方統治下的思維模式，阻礙了哲學的發展，而 Bakhtin 一貫的立場乃是鼓勵哲學以自由、無懼的、對話的姿態持續地進行思想概念上的創意創作（invention）。雖然 Gardiner 並未說明他所述的 Bakhtin 式對話所蘊藏的創意創作性是否就是語藝五大要素（five canons of rhetoric；或譯語藝五綱；沈錦惠，2011：279）中的 invention（意指針對某一議題尋求可信的、具說服力的資料的過程；見林靜伶，1993：73），但可以肯定的是，語藝學維護自由、捍衛民主的知識旨趣（林靜伶，2004：173-174），同時也是 Bakhtin 眾聲喧嘩觀點的倫理承擔。
- [3] 這裡另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詼諧風格或諧擬表述可能像是兩面刃，因為主流價值觀的諸多要素（例如英雄主義和道德高尚）很可能在特定的情節安排或故事結構下被弔詭地鞏固（而非被相對化）。例如 Bakhtin（2002b）就曾指陳古希臘喜劇風格的希臘羅曼史（the Greek romance）和歷險小說（adventure novel of ordeal）的時空型（chonotope），雖然允許情節鋪陳上的「意外」

(chance)，但故事中的意外或險境並非真正的隨機偶然，而是從屬於另一個特定的週期規則。在此，意外成為了故事情節中的既定規律、重複出現。故事主角的生命與生活亦是「與時間無涉的空白」(an extratemporal hiatus；同上引：89-90)。變動、演化、變遷的主體觀與世界觀皆於此消逝不見——雖然它仍試圖批判所有既存的莊嚴文體。從 Bakhtin 的呼籲出發，本研究後續在處理諧擬表述的解構批判性時，當更為謹慎地思考其具有的辯證性與曖昧多義性。

- [4] 另外，在 Bakhtin 的國際學術研究社群中，詼諧乃至於其於狂歡節儀式活動中的基進性，乃是經常被提及的討論議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提問質疑，類似 Dentith (1995: 76) 的主張：「民粹」和「狂歡節作為烏托邦的實踐」，具有根本的斷裂與差異，不該輕易被混為一談。然而，相關討論與本研究正文處的書寫較無直接的關聯性。因此暫時略過不談。
- [5] 這裡所說的外在性的主體位置，最基本的涵義是指每一個思想和形象都必須在與外在話語意識互動對話的過程中才得以形構其主體性和自我意識。因此，任何自我定義、自給自足 (self-identical) 的東西皆無法成為一種話語形象 (Morris, 1994: 97)。而就本研究的外在對話性定義來看，語藝言者參照外在／他人話語意識的主體形構過程，乃是後續回應霸權文化或主流意識形態的關鍵起點。因此，Bakhtin (1963/1984: 47) 強調透過外在性所形構的主體位置，不只是種「對自我的觀點」，更是種「對外在世界的觀點」。
- [6] 從正文此處的提問，本研究必須強調的是，上述三則台灣近期的公共爭議是否確切體現眾聲喧嘩作為倫理的實踐，本研究在此無意做出粗略的論斷或評估，容或對此暫時存而不論。本研究在現有的篇幅和書寫脈絡中，僅能肯定多元成家草案、廢死爭議、核四公投等議題所引發的語藝論戰，皆在不同程度和面向上有助於釐清本研究部分艱深的概念，並彰顯 Bakhtin 的理論術語於現實世界諸多爭議事件中具有解釋力和啟發性。而三則事件雖有主題上的差異，但共同涉及的，皆是透過辯論辯證以追求存在價值和主體自由的語藝倫理向度。這正是本研究的核心關懷。

[7] Butler (1997a: 65-69) 曾批評基進女性主義陣營的反色情大將 Mackinnon 主張國家應該立法限制色情的論述。Butler 說，色情本身是一種仇恨語言，而從表意的語用學觀點而言，色情更是一種行為，它展演出的乃是特定體制仇恨女人的性別意識形態。然而，如果在洞悉色情的暴力本質之後，反而訴諸國家權力的介入與政治干預，則恐有將國家權威弔詭地鞏固於言語行動之前或之外之虞。此舉一方面淪為遂意的語用論，另一方面更忽略了每一個言說行為的展演性：如果一個文本可以行動一次，它就能再次行動，並以與先前行動相反的方向演出社會規約與特定性別實踐之間的不可供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以及特定性別實踐對主流性類目的諧擬嘲諷和再意義化。關於諧擬展演與再意義化的討論，本研究隨後還會加以探討。

[8] 這裡我們不難發現，不同於柏拉圖活在天上，以超凡脫俗的口吻批判智辯士語藝「無關乎真理的探究追求」，Bakhtin 似以活在人間與社會文化脈絡之姿，正視語藝實踐和人際互動的複雜性。而 Butler 則更往前一步，從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例如仇恨語言所體現的既定社會規約和強迫性）著眼入手，思索語藝實踐本身所潛藏且有待被激發的行動力與策略性。也正是在這一點，Butler 對於眾聲喧嘩的倫理實踐及其行動策略規劃，具有不可抹滅的參考價值。然而這裡必須注意的是，即使 Butler 的語藝觀很可能即是當代語藝觀點的同義詞，但我們不宜將其論點侷限和行動策略侷限在工具性的語藝層次。Butler (1999: 181) 本身亦曾明白宣示，她試圖建立的乃是「自我及其行動都是論述中互相建構且不停變動」的政治觀 (the political)，否則她無須推敲言語行動的表意或遂意（更無須討論 Althusser 的意識形態召喚）。在這點上，Butler 的語藝觀所蘊藏的行動力，清楚地具有重構或顛覆主流意識形態、身分類目、身體規約的旨趣和理論基礎（而並非所有的當代語藝觀點都刻意凸顯這部分）。Butler 在語藝學中的理論位置，值得後續專文處理。

[9] 事實上，Butler 對於主體性形構乃是在從屬於規約之際才得以建構能動性的主張，乃是本於對 Hegel (1977) 主奴關係的重新解

讀。在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一書中，Butler (1997b: 31-62；亦見王孝勇，2009：232-233) 指陳人類在生死鬥爭之後，有一方淪為奴隸，並產生不快樂意識 (unhappy consciousness)。然而不同於 Hegel 將不快樂意識解釋為奴隸的自我棄絕和絕對從屬，Butler 認為不快樂意識反而帶給奴隸一種病態的愉悅 (sadism pleasure)，亦即透過它，奴隸獲得了某種社會存在 (social existence) 和社會身分，並據此克服了死亡的終極恐懼。由此來看，依附於禁忌並非主體性的喪失，對於 Butler 而言，抵抗、自由、主體性本就源自於權力關係或象徵秩序本身的暴力和壓迫。這是種辯證的反轉，更是再意義化和諧擬展演的前提要件。這裡 Butler (1997a: 95, 1997b: 116-117) 透過 Althusser 的意識形態召喚論陳述的「大寫他者」，已非源自於傳統政治思想中的順從／支配二分法，更非握有絕對權威、神聖力量的上帝召喚，而是得以被語藝言者錯誤認知 (misrecognition) 以形構主體性的語言效應。

- [10] 這裡明顯可以看見 Butler 受到 Foucault 系譜學的影響。相關的討論在 Butler 其他的代表性論著中，有相當系統性且大篇幅的書寫。例如 *The Psychic of Power* (Butler, 1997b) 的第三章，以及 *Gender Trouble* (Butler, 1999) 的第三部分與結論。在這些文字中，Butler (1999: 172-190) 直指她所構思的正是從 Foucault 系譜學所揭櫫的「靈魂是身體的監獄」、「靈魂的內在精神空間之形貌會銘刻於身體之上」等說法，重新想像不同於身分政治本質論者的新的女性主義認同戰略：性別是一種可能被分裂、自我諧擬、自我批判的身體行為；而透過諧擬展演和重複引述，得以進一步暴露出本質化性類目與身分類目的模仿性與社會建構性（而非先驗性），並對其加以反叛或重新部署。本研究現階段雖無意處理性別議題，但 Butler 的認同戰略規劃仍對語藝實踐的辯證性具有高度的啟發。

參考書目

- 中國時報（2013.11.04）。〈伴侶盟爭取婚姻平權 多元成家攻防 價值觀大論戰〉，《中國時報》，A6 版。
- 王孝勇（2009）。〈掙脫語言的枷鎖？從 Mikhail Bakhtin 論「表述」談起〉，《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0：203-244。
- 王孝勇（2011）。〈Mikhail Bakhtin 狂歡節概念的民主化意涵：從批判取向論述分析的理論困境談起〉，《新聞學研究》，108：183-223。
- 王孝勇（2012）。〈Mikhail Bakhtin 的對話主義及其對批判論述分析的再延伸：以白玫瑰運動為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0：149-202。
- 王孝勇（2013）。〈從對話到對立的民主化實踐：Mikhail Bakhtin 對話主義的理論轉折與政治方案之初探〉，《台灣民主季刊》，10（3）：1-39。
- 王孝勇（2014）。〈Mikhail Bakhtin 眾聲喧嘩的倫理與倫理困境之反思〉，《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8：135-191。
- 沈錦惠（2011）。〈時機與傳播情境：評介《語藝與時機：歷史、理論、實踐論文集》〉，《傳播研究與實踐》，1（2）：269-283。
- 林意仁、黃厚銘（2011.09）。〈Mob-ility 中的眾聲喧嘩——論流動／群聚的網路起闢及其政治意涵〉，「E 世代重要議題——人文社會面向研討會」論文。台灣，新竹。
- 林靜伶（1993）。〈民主自由與語藝生存空間〉，《傳播文化》，1：67-80。
- 林靜伶譯（1996）。《當代語藝觀點》。台北市：五南。（原書 Foss, S. K., Foss, K. A., & Trapp, R. [1991].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 林靜伶（2004）。〈語藝學：西方發展與在台灣之現況〉，翁秀琪（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上）》，頁 165-197。台北市：巨流。
- 邱戈（2011）。〈從對話倫理想像傳播的德行：哈貝馬斯、阿佩爾和巴赫金對話思想的比較與思考〉，《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1（1）：63-71。

- 舒子榕 (2013.11.10)。〈蔡英文 呂秀蓮 都贊成多元成家〉，《中國時報》，A6 版。
- 黃力勉 (2013.03.08)。〈蘭嶼：反核也反核廢料〉，《中國時報》，C2 版。
- 楊克勤 (2002)。《古修辭學——希羅文化與聖經詮釋》。台北市：道風書社。
- 楊絳譯 (2002)。《斐多》。台北市：時報文化。(原書 Flower, H. N. [Trans.]. [1953]. *Phaedo. enthyphro • apology Crito • Phaedo • Phaedrus* [pp. 193-40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廖子寬、王孝勇 (2014.05)。〈從 McKerrow 的批判語藝觀點看社會運動的正當性論述：以多元成家草案為例〉，「2014 傳媒的公共性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嘉義。
- 劉世怡 (2014.04.29)。〈廢死聯盟赴法務部抗議執行死刑〉，《中央社》。上網日期：2014 年 9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cna.com.tw/topic/popular/4424-1/201404290416-1.aspx>
- 劉康 (1995)。《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市：麥田。
- 聯合報 (2013.11.15)。〈超前立法：「多元成家」三胞胎不必綁在一起〉，《聯合報》，A2 版。
- 蘋果日報 (2013.03.16)。〈江揆：停建核四違憲〉，《蘋果日報》，1 版。
- Althusser, L. (1994).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 In S. Zizek (Ed.), *Mapping ideology* (pp. 100-140). London: Verso.
- Apusigah, A., Luce-Kapler, R., & Smith, H. A. (2002). Dialogized heteroglossia in teaching: A cultural analysis of two teacher movies. *Journal of Curriculum Theorizing*, 18(2), 109-128.
- Austin, J. L.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khtin, M. M. (1963/1984).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C. Emerson, Tr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khtin, M. M. (1979/2004). *Speech genres & other late essays* (V. W. McGee, Tarn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khtin, M. M. (1994a). Constructing a sociological poetics. In P. Morris (Ed.),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and Voloshinov* (pp. 160-174). London: Arnold.
- Bakhtin, M. M. (1994b). Dostoevsky's polyphonic novel: A plurality of consciousness. In P. Morris (Ed.),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and Voloshinov* (pp. 88-96). London: Arnold.
- Bakhtin, M. M. (2002a). From the prehistory of the novelistic discourse. In M. Holquist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pp. 41-83).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
- Bakhtin, M. M. (2002b). Forms of time and of the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Notes toward a historical poetics. In M. Holquist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pp. 84-258).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
- Bakhtin, M. M. (2002c). Discourse in the novel. In M. Holquist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pp. 259-422).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
- Bakhtin, M. M. (2004). Dialogic origin and dialogic pedagogy of grammar: Stylistics in teaching Russian language in secondary school. *Journal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 42(6), 12-49.
- Bakhtin, M. M. (2014.07). *Bakhtin's defen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5th International Bakhtin Conference, Stockholm, Sweden.
- Burke, K. (1969).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tler, J. (1997a).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New York: Routledge.
- Butler, J. (1997b).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L.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Dentith, S. (1995). *Bakhtinian thought: An introduc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 Francis, B. (2012). Gender monoglossia, gender heteroglossia: The potential of Bakhtin's work for re-conceptualising gender.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1, 1-15.
- Frekko, S. E. (2011). Containing Castilian in Catalan talk radio: Heteroglossia and the projection of monoglot identitie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4, 65-86.
- Gardiner, M. E. (2012). Post-romantic irony in Bakhtin and Lefebvre. *History and Human Sciences*, 25(3), 51-69.
- Gardiner, M. E. (2013). *Weak messianism: Essays in everyday utopianism*. Bern, Switzerland: Peter Lang.
- Golden, J. L., Berquist, G. F., Coleman, W. E., & Sproule, J. M. (2010). *The rhetoric of western thought: From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to the global setting* (10th ed.). Dubuque, IA: Kendall Hunt.
- Halasek, K. (1998). Starting the dialogue: What can we do about Bakhtin's ambivalence toward rhetoric. In F. Farmer (Ed.), *Landmark essays on Bakhtin, rhetoric, and writing* (pp. 97-105).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arris, R. A. (1998). Bakhtin, Phaedrus, and the geometry of rhetoric. In F. Farmer (Ed.), *Landmark essays on Bakhtin, rhetoric, and writing* (pp. 15-22).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eath, D. (1992). Fashion, anti-fashion and heteroglossia in urban Senegal. *American Ethnologist*, 19, 19-33.
- Hegel, G. W. F. (1977).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rick, J. A. (2009).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hetoric: An introduction* (4th ed.). Boston, MA: Pearson.
- Hopkins, M. F. (1989). The rhetoric of heteroglossia in Flannery O'Connor's *Wise Blood*.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5, 198-211.

- Jasinski, J. (1997). Heteroglossia, polyphony, and *The Federalist Papers*.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27, 23-46.
- Kristeva, J. (1980).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chmann, R. (2014.07). *Bakhtin's speech theory and his approach to classical rhetori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5th International Bakhtin Conference, Stockholm, Sweden.
- LaFountain, P. (2010). Heteroglossia and media theory in Elfriede Jelinek's *Die Liebhaberinnen*. *Modern Austrian Literature*, 43(1), 43-64.
- Mboti, N., & Tagwirei, C. (2014). Heteroglossia in G. H. Musengezi's *The Honourable MP* (1984). *Critical Arts: South-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28, 178-198.
- McIntire, G. (2005). Heteroglossia, monologism, and fascism: Bernard Reads *The Waves*. *Narrative*, 13(1), 29-45.
- Morris, P. (Ed.). (1994).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and Voloshinov*. London: Arnold.
- Morson, G. S. (1989). Parody, history, and metaparody. In G. S. Morson & C. Emerson (Eds.), *Rethinking Bakhtin: Extensions and challenges* (pp. 63-86).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Murphy, J. M. (1997). Inventing authority: Bill Clinton,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orchestration of rhetorical tradi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3, 71-89.
- Murphy, J. M. (2001). Mikhail Bakhtin and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7(3), 259-277.
- Murphy, J. J., Katula, R. A., Hill, F. I., Ochs, D. J., & Meador, P. (1995). *A synoptic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2nd ed.). Davis, CA: Hermagoras.
- Murphy, J. J., Katula, R. A., & Hoppmann, M. (2014). *A synoptic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4th ed.). New York: Routledge.
- Saljooghi, A. (2008). A Bakhtin reading of Kiarostami's film *Close-up*. *Critique: Critical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7, 189-200.

- Schuster, C. (1998). Mikhail Bakhtin as rhetorical theorist. In F. Farmer (Ed.), *Landmark essays on Bakhtin, rhetoric, and writing* (pp. 1-1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Vološinov, V. N. (1929/1986).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 Matejka & I. R. Titunik,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aver, R. M. (2009). *The ethics of rhetoric*. New York: Routledge.

Heteroglossia as the Practice of Ethics: A Perspective on Rhetoric from Mikhail Bakhtin

Hsiao-Yung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heteroglossia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ractice of ethics theoretically, based on Mikhail Bakhtin's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This paper outlines dialectics and utopianism by referring to the necessity of rejoinder, the limitedness/effectiveness of advocacy, and the strategy of action inherent in the rhetoric of heteroglossia. Furthermore, a possible path is explored for practicing the ethics of heteroglossia by articulating Bakhtin's stratifications of language, as implicated in the outer dialogicity of polyphonic novels and Judith Butler's parodic performance.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ethics of heteroglossia might be embodied by temporary attachment to social prohibition; hereafter, the compulsory and contingent category of the pre-given cultural norms could be strategically disclosed through the rhetorical act of rhetor furthermore.

Keywords: Mikhail Bakhtin, outer dialogicity, the practice of ethics, heteroglossia, rhetoric, parodic performance

*Hsiao-Yung W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airiti 
press.®